

杨义敏 著

回到海西

一位知识分子七十年的沧桑记忆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回到海西：一位知识分子七十年的沧桑记忆/杨义敏
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039-4827-5

I. ①回… II. ①杨…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8228号

回到海西

一位知识分子七十年的沧桑记忆

作 者：杨义敏

编 辑：杨芳州

责任编辑：刘晋飞

责任校对：唐云香

装帧设计：赵 妍 秦 华

责任印制：曾孜荣

出版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whysbooks@263.net

电 话：（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35 mm×965 mm 1/16

印 张：14

字 数：150千

书 号：ISBN 978-7-5039-4827-5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回到海西

一位知识分子七十年的沧桑记忆

书生气

偶然来到世上，生就傲睨东西。笑着花开花落早，
嗟叹楼起楼塌时，怀忧天下事。

静坐常思己过，般般不合时宜。远离冠盖惟自爱，
躲进小楼闲赋诗，人说书生气。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六十抒怀

六十甲子一瞬，岁老不改纯真。烟云过眼皆空濛，
双鬓染霜第二春，常怀父母恩。

远离尘埃世俗，奋勉自好洁身。穷达荣辱水中月，
淡泊恬然养精神，面壁练素心。

一九九八年农历九月十八

目录

007	给女儿的信（代序）	098	龙泉“四月八山”庙会
	——我是怎么写起文章来的	103	石梁杨家寻根
012	回到海西	112	记忆中的红石崖
017	第一抹阳光	125	我工作时的日照一中
022	奢想父爱	132	黄岛一中建校20周年记
028	我的母亲	139	1977年黄岛高考概况
034	刻骨铭心的怀念	144	忆1977年高考阅卷
038	姥爷的遗嘱	150	1977年高考作文批阅纪要
042	我的爷爷奶奶	158	徐山·徐福
047	二妈	164	徐福从琅琊台出海东渡？
052	我的小学老师	169	认识齐长城
057	因为这张脸	175	关于马濠
062	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180	阳武侯薛禄
068	童年时的舞台生涯	187	重建白云寺
073	老屋	193	陈姑庙与妈祖文化
078	老歌	199	黄岛的历史有多久？
083	养花	205	黄岛的变迁
087	追求时尚	217	编后记
093	三寸金莲和解放脚		



给女儿的信（代序）

——我是怎么写起文章来的

你从我的博客上选了部分文章，准备结集成书，这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把文字变成铅字，也算是个成果，总比文革时把所写的东西都烧掉要好。

说到“忧”，是因为，文章一旦印了出来，发言权在读者手中，文章是否可读，有无存在价值，心中没数。特别是最近看了一段文字之后，更让我忐忑不安——你是看过《卡萨诺瓦是个书痴》这本书的，在此书的48页写道：据说“你退休以后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写一本书”，仅次于打高尔夫球。这让人想起西塞罗的话：“世风日下，小孩子都不听大人话了，每个人都在写书。”当真如此，这还了得。但愿不是“每个人都在写书”，让“作家梦”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

你选的第一大块是回忆性散文，像《奢想父爱》、《我的母亲》、《姥爷的遗嘱》、《我的爷爷奶奶》、《二妈》等，这些“记忆”已融入我的血脉之中，几十年来，有一种摆脱不掉的忧伤。还有像《老歌》、《老屋》、《记忆中的红石崖》等，这些童年旧事也深深印在脑子里。因而，我写这些东西用不着去敲记忆的大门，也没有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所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的感觉。以前，我从来不提小时候的经历，所谓往事不堪回首，是因为不乐意触动那根受伤的神经。你或许发现，我平时很少看战争片、灾难片的，凡是能引起伤感的人物事件甚至声音，我都不愿意看，不愿意听；所以，当电视里传出哭哭啼啼的声音或有使我不快的镜头，就马上改换频道或干脆关掉。通常，人有伤心的事，找个人诉说一下，可我没有；现在终于陆续写了出来，你从中了解了我的过去，对一般

读者而言，看看小百姓曾经的生活境况，也不是毫无意义。

还有，像《因为这张脸》、《我的小学老师》、《养花》等文章，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有些内容青年人看了会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很自然的。上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很多，尽管我不是运动的重点对象，但当时患有一种“恐惧症”，一听说要搞运动就害怕，就焦虑不安，即便是斗争别人，我也提心吊胆的。那是一段很悲哀的历史，它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时代的。以上几篇，大体可以看出时代的影子。

日照一中、黄岛一中是关乎我工作历程的最重要的两所学校。《我工作时的日照一中》是写“整风反右”、“大跃进”后到“文革”前的情况；《黄岛一中建校20年记》则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写起，前后跨度20年。可以看出，学校的历史总是跟时代潮流紧密相连，它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1977年恢复高考，意义重大，因“文革”刚刚结束，那时的高考和今天的高考不可同日而语。我参加了高考阅卷，了解一些较为具体的东西，于是写了《1977年黄岛高考概况》、《忆1977年高考阅卷》、《1977年高考作文批阅纪要》等文章，让人们了解一下当时的高考状况，或许有所感慨。

我非常关心生存的环境、生活的地方，特地写了《黄岛的历史有多久》、《黄岛的变迁》二文，前者重点写文化，后者重点写变化，两篇都寄托了我对故土的爱。

你选的另一大块，是与黄岛古迹有关的文字，这是我很感兴趣的内容。我每到一个地方，很关心市容市貌，风土人情；对于古老建筑，历史文物，以及有关传说，总乐意考察一番，收集些资料。因而，凡是被定为青岛市或黄岛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都到实地游览过，说是调查研究也好，是寂寞学问也好，我确实做了些具体的事，《徐山·徐福》、《徐福从琅琊台出海东渡？》、《关于马濠》、《认识齐长城》、《阳武侯薛禄》、《重建白云寺》、《陈姑庙与妈祖文化》等文章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但我不是纯粹考证历史，因而我没有罗列历史资料；我采用随笔形式，融入了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和常见的文史资料不同。同时，我不可能把这些历史的东

西搞得清清楚楚，准确无误，所以如是告诉读者“我姑妄说之，你姑妄听之”，权当读一些历史故事，不必较真。

有意思的是，自从你替我“开博”以后，我一直在考虑：“我是怎么写起文章来的？”

记得两年前的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脑，在点地址栏时无意中闯进了你的博客，看到了你“为老爸开博”和“博首语”。想不到你干活是那么麻利，你休假来家，只是随意地说了一句“开博”的事，没想到回京后马上行动，这让我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有压力，当时就有被逼上梁山的感觉。

你知道，我虽写了些文章，但一直藏诸“深山”——存在电脑里，是不轻易示人的。你把文章捅出去，忽而多了一份责任，再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了。曹丕说，写作是“经国之大业”，我想那是指圣人、贤人说的；就一般人而言，写作毕竟是很个人的事。你一开博，我就添了一份牵挂；现在要集中成书，我的心事更重了。

你在博首语中说我“从来都喜欢读书写作”，我好像没有那么勤奋。平时，我并不是非常勤于动笔的。不错，小时候，并没有人督促我读书、写作，可我那时对读书写作就很感兴趣。当时，老家的厢屋里堆放着一堆杂物，除了祖父的账簿以外，全是我爸爸读过的书。线装书、英文书我读不懂，能读的书当时也似懂非懂，如《天方夜谈》、《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之类；还有一些属于蝴蝶鸳鸯派的东西，如《海外月传》，还有侦探小说《就是我》等。另有当时的报刊、画报，上面有刘长春代表中国到美国参加奥运会的文字和照片；有王人美、阮玲玉、周璇这些明星的故事和照片，等等。令我奇怪的是，当时家里竟然没有一本“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十大才子书”之类的书，这使我从小就偏爱西方的文学艺术，而对传统的经典就“先天不足”了。

小时候我喜欢照着书刊的插图画画，喜欢唱歌，很小就会简谱，到小学高年级就写日记了。初中时候，读了一些普希金的诗，背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达吉亚娜给欧根·奥涅金的信》，后来渐渐又接触到德国的海涅，英国的雪莱及匈牙利裴多菲的诗，并且自己也胡乱地写诗，试着将

些模糊的朦胧的情绪写下来。初二时，李肇星的作文上了《少年文艺》，在学校引起不小轰动。那时，我一篇作文有时也能写一本子，但文章时好时坏，老师有表扬有批评，始终不是很好。当年，苏联、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对我的影响很大。像高尔基、大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的小说，像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像克拉姆斯科依、列宾、列维坦、希什金的油画，像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等，都为我们那一代人所熟悉。在初中时，我就能唱五六十首苏联歌曲、俄罗斯民歌，可以说，我们那代人是唱着苏联歌曲长大的，直至今天仍有一种苏俄情结，一提起那些东西就觉得特别亲切。再后来，我的阅读面扩大到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英国的狄更斯、莎士比亚，德国的席勒、歌德等。

1959年参加工作后，阅读了一些哲学、美学方面的书。此间，不光读了《约翰·克里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等长篇，还读了莫泊桑、梅里美的短篇小说；勃朗特姊妹的《简·爱》、《呼啸山庄》，杰克·伦敦的《海狼》、《雪虎》、《荒野的呼唤》，还有马克·吐温的小说也是这时读的。后来，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增多，大气候越来越紧，读书有不少禁区：古代的是封建主义，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当时读这些“封、资、修”东西就不合时宜了。那个时代，喜欢读书是不问政治的表现，是不光彩的事，每次运动是要写检查的。但是，不管明着、暗着，总是还在读书，写日记，写读书札记等。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形势骤然变化，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人给我贴了“剥去杨某某名洋古的画皮”的大字报，我看到有人被抄家了，我就把写的诗、日记等全烧了，从此发誓再不写此类文字。

文革结束后，教学逐步走上轨道，教学任务越来越重，后来，我长期送高三，除写“下水作文”、教学论文、专题讲座之类的东西外，给报纸写了些言论，很少写散文类的文章。

我是语文教师，读书很杂，除了与业务相关的书籍外，其他根据所好几乎不加选择。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感到“国学”博大精深，于是

生吞活剥，读了不少东西，如《史记》、《资治通鉴》，如《论语》、《孟子》，如《世说新语》、《闲情偶寄》等等；读了唐诗、宋词，还读《白香词谱》、《中国古代诗体通论》之类的书，学习写古诗词。不过，我在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这些名著时，都没有当年读西方名著那样投入、那样着迷，这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

文革后我再没有读小说，但阅读面越来越广，古今中外，哲学的、宗教的都有所涉猎；连柏拉图的《理想国》、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也拿来啃，搞得我晕头转向。但，凡书，只要读就有收获。它启迪心智，拓展胸襟；提高了悟性，激活了思想；许多时候，是看了别人的著作后自己才想写作的。因为长期阅读的熏陶，我在写作时，很注意文章的气势、韵味、节奏、语言。只要文章读起来不上口，或哪句话多个字少个字感到别扭的，就马上修正，不然就不舒服。

退休后，在老年大学编书，在区文联编杂志，因为需要，写些随笔、散文类的文章。后来杂志不办了，没人催稿了，高兴了就写，写不下去就不写。好在现在有电脑，写一篇，写半篇，或是写几句，写个题目，存起来就不管了；加上我的兴奋点太多，要弹琴，要练字，还要摄影、养花、养鱼，写作时间得不到保证。总之，离你说的“从来都喜欢读书写作”差得很远。

清代诗人龚自珍有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当年，我畏“文字狱”，发誓不再写作；今天大气候、小环境都宽松了许多，写文章不再怀有恐惧；我衣食无所忧，名利无所求，更不必“为稻粱谋”了。写作是一种生命力的释放，有写作冲动时，情之所至，心之所思，如汨汨小溪，自然地流淌，这既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享受。可告慰的是，所写东西，经历本身连着历史，文字背后透着良知，除了记忆还有思考。但我自觉不是退休以后想“写一本书”的队伍中的一员。

人生苦短，文章易朽。倘若所选文字不是毫无价值，我心里就塌实了。

2010年8月

回到海西

我说的海西，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它主要指胶州湾西海岸沿线的重镇，如薛家岛、红石崖等。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 1898 年，中德签订胶澳租约时，薛家岛、黄岛、红石崖等地就曾划归青岛为德国人所租借。民国十八年（1929 年），青岛建特别市，直属南京政府。这时的青岛又在胶州湾西岸设区，薛家岛、红石崖等地就属于青岛特别市海西区。其后，行政区划虽几经变化，但“海西区”基本上保持到民国三十三年。1945 年 8 月，薛家岛、辛安、红石崖等地解放，曾一度划归珠山县，不久珠山县撤销，又归属胶县。1945 年 12 月，改属于八路军青岛海西办事处。1946 年 9 月，划归新成立的胶南县，直至全国解放。另外，海西又是一个习惯称谓。那时，青岛市里和青岛西海岸有海东、海西之称。人们在西海岸乘船到青岛说“过海”，而不说到“海东”；而从青岛乘船到西海岸却都习惯地说上“海西”。语言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约定俗成，以至整个胶州地区甚至鲁西南、苏北地区，从海上来往青岛的人都这样叫法。

我生在青岛，为什么要回到海西？这得从我的童年说起。

小时候，我们全家三口住在莱芜一路 38 号。爸爸是盐务局的职员，妈妈是家庭主妇。他们都很忙，常常把我撂在阁楼上。我是那样孤独寂寞，经常一个人在墙角抓“潮湿虫”。这种小虫不咬人，你一动它就缩成一个“球”，觉得怪好玩的。我偶尔也到厨房去，妈妈拉风箱烧饭，我趴在她背上，一俯一仰，像在摇篮里似的，那么舒服。一次，一只小蜘蛛拖着长长的丝，从天棚上往下滑，妈妈看到了高兴地喊：“看，喜蛛蛛！”接着便教我唱：“喜蛛蛛有喜没有喜？有喜落到底，没有喜高起起。”这时，我多么



小时候，我们全家三口住在莱芜一路38号

盼着喜蛛蛛落下来，永远不要回到天棚去。妈妈也专心地看着，像是期待着什么。

后来，我家搬到西岭范县路11号，住在两间平房里。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两个木箱。那些蟑螂多得吓人，至今想起来还令我毛骨悚然。爸爸妈妈为生活在外奔波，我常常被锁在屋里。这时，我只能从玻璃窗上看外边的光景。马路上的行人大多是来去匆匆的，一个留着大分头的脸色憔悴的卖报人，几乎天天准时从窗前经过，我老远就听到他“新民报、新民报”的叫喊声。有时天降大雾，海上“铁牛”哐哐直叫，外面雾蒙蒙的，很少行人，偶尔能看见几个穿黑服的修女。不知怎的，这画面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它令我有一种莫名的凄楚和恐惧。记得，当时经常拉“防空”警报。晚上，大人们常常把窗户遮得严严的，不让一丝灯光透出去。我吓得不敢吭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爸爸妈妈下了班，我到大院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唱“蝴蝶飞在青草地”，做“监牢狱”的游戏。有的大孩子，还常常把我们小不点儿组织起来，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领头的举着“青天白日”的小旗，大家唱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歌，认认真真、热热闹闹

地。可在这“青天白日”之下，我的童年并不快乐幸福。后来，时局发生了变化，日本鬼子走了，美国鬼子来了。我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我6岁那年，爸爸因病去世，从此，我家的生活更困难了。在那个年月，孤儿寡母在青岛是没法生活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妈妈想起了海西的老家——红石崖。

当时，红石崖是解放区，可解放区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伯父在西镇云南路开了家小饭馆，来来往往吃饭的人很多。有一次，我伯母向一个自称“老乡”的人打听“海西”的情况，说我们在市里待不下去了，打算回去。他说：“怎么，你们还敢回去？共产党共产共妻，没听说吗？”说着，伸手做了一个“八”字的手势，朝着我说：“八路军红眼绿鼻子，你怕不怕？”他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听他讲话，更来劲了，“小孩子要参加儿童团打仗，大闺女小媳妇都得光着脊梁在村头纺线、查路条，你们还敢回去！”妈妈和我听了将信将疑，很有些害怕，但因生活所迫，最后还是回到了海西。

到了红石崖，住进我们家的老屋。当时，还在搞土改，村民们和村干



爸爸是青岛盐务局的职员

部都说，我母亲自进了老杨家门，一天福也没享着，他们很同情我们娘俩。街坊邻居问寒问暖，亲戚朋友送粮送物，我们安顿下来，生活很快有了着落。从此，妈妈脸上有了笑容，干活时常常哼着《妇女自由歌》。有时候，村里妇女开会，她也积极参加。我在镇上的小学上学，学校就在镇东头的大庙里。本来，解放前大庙对面有一所学校，白墙红瓦，玻璃门窗，很整齐漂亮的，解放时遭到破坏，一直没有

修复，就把学校设在庙里。庙里的神像解放后被捣毁，大殿、配殿贮存很多粮油，东西两厢做了教室。当时，教学设施匮乏，办学条件很差，没有教材，缺少教师，教学质量更谈不上；但上课学生能学习识字，下课同学能一起玩耍；遇上开会，儿童团互相拉拉唱歌；有时还被派去站岗放哨、查路条；就冲着这些，大家还是喜欢到学校去的。



爸爸因病去世，我家的生活更困难了

回到海西后，我家境况确实比以前好多了，但日子并不太平。有

时候，夜间突然传来枪声，有人说是当地土匪郭立茂的人偷袭我八路军、武工队；有时候，枪炮声突然把我们梦中惊醒，有人说是盘踞在青岛的还乡团，乘火轮从海上骚扰海西群众。有时候，听人说，某某被砸了“狗头”，因为他替国民党办事；某某被敌人杀害了，成了革命烈士。时局动荡，白色恐怖，经常搞得人心惶惶。

记得，1948年10月的一天，忽然听说“国民党”来了。我妈二话没说，拽着我就往外跑。只见公安局的人、各机关的人，也纷纷往外撤，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我们从镇子东头刚出去，眼瞅着国民党兵从镇西头进来了，形势非常危险。母亲领着我先跑到野外的沟底躲起来，到黄昏时，才投奔到小殷家一个我叫姨姥姥的人家——后来才知道，这些国民党的兵是由驻青岛的106师和青岛警备旅的人员组成，共一万多人。他们从青岛桃园出发，途经胶州、红石崖，直奔薛家岛，实际上是为最后撤离大陆做准备的——三天后，国民党的队伍占据了薛家岛，红石崖已经平静下来，我和母亲才回到镇上。当时的情景令人目不忍睹：镇东头那座曾经做过学校的大庙被彻底烧毁；庙内大院中存放的大批量的花生油连同花草树木被烧得精光；一幢石砌的钟楼竟然被大火烧得粉碎。所有机关被砸，粮库被